

彩色香港

1970s-1980s

高添強 著



彩色香港

1970s-1980s

高添強
著

責任編輯 任秀雯

協力 鄭瑞華

書籍設計 李嘉敏

書名 彩色香港 1970s-1980s

作者 高添強

出版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版次 二零一四年七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十六開 (167mm × 230mm) 一九二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379-5

© 201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八 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的香港 高添強

一六 香江新顏

五二 生活速寫

九四 城市蝸居

一三八 湮滅無存

一六六 鄉郊百變

彩色香港

1970s-1980s

高添強 著



何佩然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是香港經濟快速增長的年代，社會資源也較戰後初期充裕。現代建築技術的應用，使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核心區域摩天大廈林立，就算是一般的住宅區，樓高也有二十多層，新市鎮亦逐漸都市化。城市藉著各式各樣的現代設施如啟德機場的跑道、過海隧道、高速公路、地下鐵路等等成為國際知名的大都會；而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也好像其他大城市一樣，日趨嚴重。

現代的攝影技術，隨著科技的發展，也變得愈來愈先進，本書所蒐集的每一幅色彩斑斕的影像，都巨細無遺地把當時的實際狀況紀錄下來，栩栩如生地述說著當年的生活點滴，讓每一個記憶重新活現，教人回味無窮。

馬冠竟《香港工程考》及《香港工程考II》作者

對於「戰後嬰兒」來說，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正是他們創造和見證香港繁榮躍進的時期，值得自豪。書內的新填海、海底隧道、跨海大橋、東區走廊、擴建啟德機場、葵涌貨櫃碼頭、地鐵、沙田和屯門新市鎮等基礎建設，他們或多或少都有貢獻。摩天大廈是香港的標誌，工程師以先進的物料配合嶄新的結構形式和建造科技，不斷打破樓宇高度的記錄，康樂大廈、滙豐和中國銀行大廈便是最好的佐證。不少「戰後嬰兒」同樣經歷過寮屋、棚屋和公共房屋等階段，這些彩色照片必能勾起他們往昔的回憶。除社會面貌外，那時港人的生活場景如各行各業、交通、天台學校和街市等，都盡入眼簾。筆者走進這時光隧道內，甚有共鳴。相信讀者在欣賞和回憶的同時，亦可挑選出他們心儀的明日「古蹟」。

ISBN 978-962-04-3379-5



9 789620 433795

HK\$118.0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彩色香港

1970s-1980s

高添強
著

謹以此書紀念庄野晴己老師（一九三七——二零零一）



目錄

八

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的香港 高添強

一六

香江新顏

五二

生活速寫

九四

城市蝸居

一三八

湮滅無存

一六六

鄉郊百變

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的香港

一九六零年代末，香港已經具備一個成功經濟體系應有的條件：廣大的貿易網絡、穩固的工業基礎、現代化的國際銀行業務體系、完善的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還有教育程度尚可的勞動力。

從一九六零年代起，製造業已成為香港經濟支柱，及至一九七零年更達高峰，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點九。這段時期香港是世界上最工業化的社會之一，但是大部分的工廠規模都不大，很多工序並不需要很高的技術。其後十年間，製造業佔生產總值仍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七至二十八之間，不過與之前相比，重要性卻漸次下降，勞工密集、出口帶動的工業，再難保持旺盛。工資和地價不斷上升、勞工短缺、鄰近地區競爭、西方經濟發展放緩、保護主義抬頭等，都使香港無法再以廉價產品於世界市場取得優勢。本地工業必須改變，才能在新形勢下生存。為支持工業發展，政府除鼓勵工業家轉移投資到資本及科技密集的生產業外，更陸續開發大型工業邨，以吸引科技水平較高的工業在港立足。

香港的經濟發展從一九七零年代後期出現重大改變，以金融業為核心的服務性行業漸漸崛起，香港進入戰後第二次經濟轉型。此外，經歷了三十年的停滯後，內地經濟的高速增長亦令本地的轉口貿易生機重現，並加快香港的經濟轉型。

由於日本不肯開放金融市場，新加坡一度成為香港發展金融業的競爭對手，惟自一九七零年代末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經濟政策後，大量跨國公司及銀行相繼來港開業，香港漸漸超越新加坡，成為繼倫敦、紐約之後，新興的國際金融中心。銀行業務迅速擴展之餘，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黃金市場等多種金融工具亦告成形，香港金融業朝向國際化及多元化方面發展。

房地產發展也大大推動了香港的經濟成長，不過伴隨而來的是一輪清拆重建的熱潮。新的建築往往是以貴重建築材料來顯示財團的「身價」，或單一地追求興建速度而不考慮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或把建築物看作純粹的商品，而不關心它們對社會及居民生活的影響，結果香港充斥著大量無視環境的建築，當中的設計亦沒有表現任何地方特色。

另一方面，大量湧入的外資，特別是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對本地經濟不無裨益。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末，華資公司的實力已開始超越英資洋行，華人企業家更建立了三個股票交易所，與英籍人士主宰的香港證券交易所分庭抗禮。

由一九六零年代進入一九七零年代，本地生產總值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至

一九八零年代初，共增加了四倍之多，即使以國際標準衡量，已位於中上游，及至十年後，更躍居全球前列。這看來無疑是重大的成就，不過對不少市民來說（不計新移民），生活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原因之一是部分中年工人自離開工業生產後，在新的經濟模式下已無法找到新工作。

一九六六及六七年的動亂促使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為青少年提供較多機會，以及採取其他措施如改善房屋、衛生和社會福利，以緩和社會不滿的情緒。政府亦意識到，若能照顧市民的利益和意願、施政上多考慮市民的需要，社會便較能接受和認同殖民地政府。

從一九七零年代初開始，政府重點發展普及教育。免費小學教育於一九七一年推行；七年後，九年免費教育亦得以實現。自此，六至十五歲的兒童終於能夠在較公平的條件下上學。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由於實行免費教育，在學兒童或青少年即使年齡相若，學習能力相若，所受的教育卻可以出現很大差別，這樣的例子在同一家庭也不鮮見。

本土教育體系亦漸趨成熟。教育署設置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負責議定課程大綱，取代以往從英國引進的課程。課本則由本地教師和學者編寫，使用進口課本的情況因而日漸減少。一九七零年代學生在課堂上學習的內容與上一輩比較，大有分別，例如中學教育兼具中國和英國教育的特色，課程的主要教學語言，英中皆有，不過這卻帶來問題。由於市場需求，大部分學校都是英文中學，可是不少接受英語授課的初中學生，英語水平根本不足，而教師的

英語能力也可能力不從心，結果上課時往往中英夾雜，令很多學生無法掌握學習內容之餘，也難以學好英語。

至於大學教育，一九七零年代政府仍根據市場需求而設定學額，而不是依從中學畢業生的升學意願和能力適當地調節；也就是說，大學生的數目不能超過市場的吸納能力，結果是大部分考試成績符合大學入學資格的學生，仍被拒諸大學門外。不過隨著經濟發展，社會上各行各業對受過專上教育的人才需求甚殷，為了不致落後於競爭對手「亞洲四小龍」，從一九七零年代後期起，政府開始積極拓展專上教育，並於一九八零年代設立多所院校，如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香港演藝學院、香港科技大學等；此外，又增加對專上學院的撥款及資助。

住屋方面，一九七三年以前，香港已有百多萬市民居於公營房屋，包括徙置區、廉租屋和屋宇建設委員會轄下的新邨（如北角邨、彩虹邨等），不過港府一直都沒有整體的房屋政策。直到十年建屋計劃（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二年）面世，香港始建立起長遠而全面的房屋發展藍圖。在新政策下，過去分散的部門併合為一個統一的、給重新賦予法律地位的香港房屋委員會。自此，新建的公營房屋在建築設計及質素上均有所提升，房屋管理也有明顯的改善。可惜由於官僚架構重組問題、石油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可發展的市區土地日漸減少，以及內地移民湧入，使計劃未竟全功。一九八三年，仍有約十萬家庭居於寮屋。

十年建屋計劃其中一項顯著成就，是將市區人口遷移至新市鎮，以及利用公營房屋推動新界

發展。計劃原以自給自足和社會平衡為目標，前者是在新市鎮內提供設施以滿足居民的基本生活及工作需要，後者是指營造多元化而和諧的社區。然而兩項目標均未能達成，尤其是居民就業遭遇很大的困難。不過較佳的居住環境和較短的公屋輪候時間仍吸引了大量市區人口遷往新市鎮。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的新市鎮建設帶來了上百萬人口的內部遷徙，社會並沒有出現不穩，與其他地區的經驗相比，還是令人欣慰的。

公共交通運輸在這段期間亦取得急速的發展。一九七二年海底隧道通車，港島和九龍得以直接聯繫；一九七九至一九八零年間通車的地下鐵路，加上九廣鐵路電氣隨著公共交通的急速發展，使不論居於港島、九龍或新界的人都感到自己同屬一個地方——香港，而不再是從屬某一地域。此外，新市鎮的發展也令鄉郊和市區的界線變得模糊，對城市居民來說，新界再不是陌生的地域。

另一個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是貪污問題。一九七零年代初，貪污受賄已滲透到政府每一角落，大多與民生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如警務處、消防處、工務局、市政事務署、徙置事務處、人民入境事務處等都牽涉其中，其中甚至包括集團式的貪污，情況已經無孔不入，市民與政府部門的日常接觸，便經常受到無休止的敲詐勒索。一九七四年初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自此香港步進新時期。不過公署卻面對另一個嚴峻形勢，由於很多警察被捕，警隊士氣大跌。一九七七年十月，數千名警察遊行示威，要求削減公署權力，部分示威警察更衝擊公署總部。由於擔心警察罷工，麥理浩結果頒布有條件特赦令，不追究過往的貪污罪行。

與此同時，戰後出生的一代已漸漸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以香港為家，更以「香港人」自居。相對於他們的上一輩，他們不再拘泥某一社團或籍貫，並以新的精神面貌、開放的思維工作和生活，當中不少更從農民或工人子弟而成為專業人士或晉身中產階層。這一代的年輕人造就了這段時期的進取和開放，使香港有別於其他華人社會，這和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也有一定關係。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漸漸接掌了大眾傳播媒介，並引領普及文化的潮流，對香港的歸屬感亦慢慢滋長。一旦有了這種醒覺，加上教育日漸普及，市民開始提出訴求，要求改善社會，因此出現一連串的抗議、示威、罷工及罷課等活動，如中文運動（一九七零）、保釣運動（一九七一）、反貪污示威（一九七三）、小學教師罷課（一九七三）、護士工業行動（一九七六）、金禧中學事件（一九七八）、艇戶事件（一九七九）等，都不是偶然的。這些基本上均為社會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領導人與政治大都無直接關係，而是大專或大學、教師、社會工作者、教會改革者和工會組織者等。

與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的暴力和非理性的騷亂比較，這些活動雖然觸犯了當時禁止的「非法集會」、「非法結社」等法律，一般來說都是和平而有秩序進行的，並漸漸改變了香港的社會面貌。他們爭取到一定的成果外，也使公民社會慢慢在港植根，民間和政府能夠和平地互相制衡，社會和政府逐漸開放，市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日漸增加，不同利益社群可以理性對話，而不是暴力對抗。